

思忆文丛

季羨林



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牛 汉 ● 邓九平 /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思忆文丛

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牛 汉 □ 邓九平 /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月雪/牛汉,邓九平主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9

(思忆文丛)

ISBN 7-80127-496-2

I.六… II.①牛… ②邓… III.反右派斗争-1957-
史料 IV.D6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797 号

责任编辑:文 非

封面设计:康笑宇

六 月 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 汉 邓九平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25 印张 369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27-496-2/G·217 定价:25.00 元

24/10/11

前 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官刑,苟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1957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目 录

前 言

- 胡 风 / 斗争的经过 1
- 贾植芳 /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8
- 牛 汉 / 重逢胡风 22
- 牛 汉 / 重逢路翎 32
- 邵燕祥 /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38
- 钱理群 / 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 44
- 康 濯 /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63
- 李慎之 /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113
- 储安平 /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137
- 戴 晴 / 储安平与“党天下” 139
- 章乃器 / 我的发言 177
- 章乃器 /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
第一次发言 181
- 章乃器 / 在民建会、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
第二次发言 188
- 章乃器 /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197
- 章乃器 / 我的检讨 200
- 章立凡 / 章乃器在1957年 207
- 章立凡 / 章乃器传(节录)——最后的历程 238

- 翟作君 / 章乃器——中共的诤友 244
- 王蕙炎 / 章伯钧 / 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255
- 章怡和 /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259
- 罗隆基 /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276
- 罗隆基 / 加强党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278
- 谢 泳 /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286
- 葛佩琦 / 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 297
- 葛佩琦 / 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 298
- 戴 煌 /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 300
- 费孝通 /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320
- 费孝通 / 关于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的发言 331
- 钱伟长 / 言论摘要 337
- 王造时 / 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上 345
- 夏高阳 / 王造时冤狱侧记 347
- 何碧辉 / 王造时传(节录) 357
- 赵寿龙 / 陈新桂 / 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 367
- 顾执中 /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370
- 黄绍竑 / 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372
- 李康年 / 重申赎买 20 年的主张 376
- 黄药眠 / 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383
- 黄药眠 / 我的看法 390
- 黄药眠 / 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394
- 黄药眠 / 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398
- 黄药眠 / 在 1957 年 5 月 11 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401
- 黄药眠 / 在 1957 年 6 月 5 日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

发言 403

- 杨占升 / 学者的风范——缅怀黄药眠先生 415
- 白 鸿 / 我心目中的药眠同志 421
- 钟敬文 / 破浪前进 429
- 钟敬文 / “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431
- 钟敬文 /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435
- 钟敬文 / 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 438
- 傅种孙 / 中共失策之一 443
- 傅种孙 / 在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447
- 傅种孙 /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 454
- 傅 鹰 / 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457
- 董渭川 / 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 464
- 徐中玉 / 三个问题 470
- 叶笃义 /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 477
- 张岱年 / 曲折的道路 479
- 傅振伦 / 蒲梢沧桑 487
- 左言东 / 我的思考 495
- 王铁崖 / 清肃官风, 发扬学风 501
- 梁漱溟 / 咏“臭老九” 507

胡 风

斗争的经过

1953年4月到1953年5月

一、1952年2月,得到了暑假搬家的允许回上海。计划是,在上海参加一下工厂的民主改革(后来是参加了“三反”),整理一下自己和积存材料等,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参加工作或争取到朝鲜去一次。这时候就听到了传闻,说文艺上将有一次大论争,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当时觉得,研究我的文章,那是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所说的大论争不大明了,更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因为,由我看来,理论是为了服务于实践的;当时正发生了一些使作家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赶任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怎样表现工人阶级的问题等,正在迫切要求得到理论上的解答,对一些作品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一片混乱,也正期待着研究和分析,怎么会丢开这些去争论过去的问题呢?

二、4月初,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检查以后,觉得问题不好处理,觉得用这样不妥当的做法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的。当时给彭冰山同志看过,他看了说,内容说不上什么,并说周扬同志要路过上海,那时候谈一谈看。同时看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没有出版年月和出

版处的。

三、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同时，《文艺报》也准备对夏衍同志过去的作品作一总的批判，周扬同志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

四、同时，彭冰山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本来，我早想从《讲话》中提出几个原则来从实践情况分析一下我的体会，但解放前没有可能做，解放后我没有写理论批评文字，而且，一涉及实践情况总有许多顾虑，所以只想等安定了以后再说。但想不到这成了一个表示态度的问题。

第一，在我的工作中，总是从党底政策和毛主席的文章寻求指引，对于具体环境下的实践角度和实践态度的指引，从来没有从正面解释过党底政策的；我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和毛主席思想整体相联的部分，不能教条式地去应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引用过某些论点的。

第二，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也曾就蒋管区的文艺实践与民主斗争的结合问题，从思想改造这个角度上作过考虑，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逆流的日子》，19—39页）。那文章里没有明提，是因为顾虑到审查关系；就是这样，那文章还被扣了一些时，后来被删去了那里面说到新文艺底战斗任务的几句。

第三,就我所知道的,当时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冯雪峰、邵荃麟、以群同志等,就没有写过文章。但虽然如此,我还是马上着手写了。当然是根据实践情况,尽我能有的理解写了的。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写的理论性文字。题为《学习,为了实践》。当时据我的估计,写了也不会发表,更不会了结问题的。我也把这意思告诉了彭冰山同志。

五、文章刚刚写完,正在斟酌中,就看到了《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同时,《文艺报》在广泛地动员通讯员们检讨胡风理论,写文章,开座谈会等;读者同意的就奖励,不同意的就批评,以至取消通讯员资格(这做法一直继续到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发表了以后的相当的时间内)。我的《学习,为了实践》,由彭冰山同志送北京审阅。我附一短信给周扬同志,告诉了他我看了《人民日报》按语以后的惶惑情况。彭冰山同志也觉得《人民日报》按语不妥,是“不负责任的”。周扬同志回信,说我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后来在会上他说我不该“大骂”了一通公式主义),但叫我到北京来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我开始再检查我的几本小册了。

六、车票买好了,上车的当天看到了《文艺报》六十六期发表了两篇“读者中来”,是要求公开批评我的文艺思想的。因为《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第一篇“来信”,我作了简单分析附在给周总理的信里,这次换了另一篇;但第二篇还是在《内部通报》发表过的第二篇,只改了几个字,是专门指出我对何其芳同志的“恶劣态度”的。既然我提出了问题,周扬同志又约定了我来北京大家讨论问题,但在我来北京之前赶着发表了这来信,这就造成了一种很急迫的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问题的情势。彭冰山同志觉得这就把问题弄得更困难了,但觉得还是来北京的好,我自己更觉得有到北京来了解党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意见的

必要。

七、到北京后到开会前，见到过周扬同志两次，每次大约十多分钟。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我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底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底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来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多和我谈。

八、丁玲同志见面多些，但她说不搞理论，提不出意见，只问我和香港争些什么问题。又说《文艺报》收到了一百多封信。

九、我向其他同志征求对我的文字的意见，如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但都说没有时间看我的文字，只说些一般性的意见。冯雪峰同志接触了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有的提得很严重，但在我看来，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是人事问题，已无法挽救，有的只能当作理论问题去检查。托林默涵同志请过胡绳同志提意见，但因为他忙没有机会。

十、周扬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说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林默涵同志也传达过周总理的指示和胡绳同志的意见，也是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周扬同志还要我自己在会上说话，说也许是别人误解了我。我当然是需要把过去彼此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的意思。但看一看气氛和同志们的态度，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觉得没有这个

可能,所以决定了用“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对待这个问题,专门检查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申辩,尽可能快些做一个初步的结束,写出检查来,免得多费同志们的时间。就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的时候,周扬同志依然用的是严厉的口气,现出了冷冰冰的不屑多谈的神气。

十一、但除开检查出来了对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违反了毛主席的分析和结论以外,在我的理解上,其余都是同志们对于一些文字上的误解或者我在文字上的缺点问题等。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其余的限于水平,实在找不出来,所以只好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提得具体些,给我帮助。例如同志们说《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有反马列主义的东西,但我自己在关于文艺的分析中找不出原则错误,只是耽心对于政治发展情况的叙述和社会内容的分析也许有不妥之处,和强调一点因而会引起片面印象之处。

十二、周扬同志交来了周总理的信,除文艺理论以外还提到应该检查“生活态度”。读过以后我反复地思索过,感动地发现了这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以我这个追随党的事业的人说,首先应该澄清对于组织的错误态度,那以后,才能够顺利地检查理论问题。周总理是把我当作阶级事业的一个追随者看待,所以才指示了这一点的。冯雪峰同志还说这对我不一定有必要。但周总理指示我多和周扬、丁玲同志洽商,由于前面说过的情况(周扬同志说他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接头;丁玲同志说不搞理论,没有具体意见,后来她又不在北京),没有可能做到。

十三、怀着感激和自愧的心情,写完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以后,我的情绪上得到了很大的澄清。我是尽可能体会了周扬同志所说的“抽象地看党”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思写的。于是又重新检查我的几本小册子,一面尽可能征求各方面同志

们的意见,并等待开会听意见。

十四、9月6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住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底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申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底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底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好像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周扬同志是主持会的,他连后一句都没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

十五、我详细慎重地考虑了同志们底发言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检查以后,感到困难得很。困难之一是,无法确定同志们底要求目标。例如冯雪峰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说过不是算旧账,但林默涵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又说“本来就是算旧账”。于是一面再检查,一面等待同志们进一步提意见。因为周扬同志在会上又说过要大会小会轮流地开的。

十六、9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舒芜底《致路翎的公开信》,前面加上了“编者按”。这封信在开第一次会的前一天,我

收到了打印本。看了以后,觉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说的理论问题不但混乱得很,而且也是和我连不上的。对路翎同志的批评,在我看也是和路翎同志连不上的。路翎同志为了对党负责,他写了和舒芜的关系的报告,送呈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但舒芜底《公开信》还是公开发表了,只不过删去了几处太明显了是捏造的事实。

十七、就是《文艺报》出版的这一天下午,林默涵同志来找我,一道到中山公园谈了几小时的话。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除了一些政治情况,胡乔木因病休假和习仲勋同志来主持中央宣传部的事情以外,主要的内容有这些:(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底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关于我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发表了舒芜文章的当天(舒芜十多天前到了北京),林默涵同志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当时使我很迷惑。他说过“就是要算旧账”,现在又说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那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底目的到底在哪里?想问他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结束但又觉得不能由我提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当林默涵同志提到胡乔木同志的时候,两次提出过想和胡乔木同志谈一谈,得到指示,后来在北京剧场偶然见到胡乔木同志的时候,也当面提出过,但都没有得到回答。现在看到林默涵同志似乎谈得诚恳,我又提出希望看一看胡乔木同志底病。林默涵同志后来一直没有回答,我

就完全找不出把问题放到正常道路上的努力方法了。

十八、因为同志们一再提到“小集团”，我有责任交待，我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把我所知道的党员与非党员投稿者列出名字来，便于组织上检查。因为同志们一再追究和舒芜的理论关联，舒芜又坚持说他的理论是完全依从我的，我有责任交待，写了《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我只简单地说明直接和我有关的事实作了自我批判，对解放后我所了解的舒芜底情况不加叙述和判断，免得同志们误会我是想封他的口的。

十九、在这期间，除了《文艺报》在继续加紧动员读者批判胡风及其“小集团”以外，《人民日报》“文艺组”也向全国通讯员发出了《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通讯》，第二十八期，十月一日）。

二十、这中间，我一面检查自己，一面等待开会。但这时候从其他工作岗位的同志得到了暗示：这情况不是僵持起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还传来了这样的意见：别人提意见也提不出什么的，开会不过是形式，不要以为意见提得那样严重就真是那样，还是就可以检讨的检讨；党是爱护我的，检讨了不会对我苛求，但不检讨我就决不能解决组织问题，除非从此搁笔；不检讨，我自己无所谓，但和我有关系的青年就要吃苦了……。我这才领悟到：并不是现在要把理论问题弄清楚，主要地是要我通过理论问题在群众面前表明对党和党员同志们的态度。

这时候记起了丁玲、冯雪峰同志都提过“他们希望你写一篇文章”的话。

二十一、但在我看来，在理论上表明态度，那当然也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如果抱“过关”思想，离开了实际的感受，把自己没有真正理解到的问题用一些概念说法给自己戴几顶帽子，那固然省事，但那一定要产生有害的效果的。党

不会要我这样，同志们也应该是不希望我这样的。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向林默涵同志征求同意：不等再开会，就动手写一篇，但有的问题要解释一下。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因为近年来实践情况我不大了解，检查起来需得参考许多材料，暂时不触及，以后再专门去整理。林默涵同志同意了。关于需要解释的意思，也向冯雪峰同志谈过，他也同意了。他还笑着说，“不能屈打成招的！”这就写成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现在我一再从回忆中检查当时的心情，我是尽可能有的理解诚恳地写了的，我是用对党说话的心情写了的。是当做党给我任务做的。如果有错误或有不充分之处，那是由于自己的理解力无法达到的缘故。我是希望同志们当作一个我是在尽可能有的限度上做的一个努力结果看的。11月18日送呈。后来夏衍同志说：不发表我的检讨而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底批评，是因为我不该在文章里做了解释。但实际上我是事先得到的批准的。

二十二、11月26日，开第二次会，人数扩大了，其中有路翎和舒芜。事先，林默涵同志要我把《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底内容口头上再报告一次。我觉得写出了用不着再报告，但他说大家忙，无时间详看，还是报告的好。在会上我作了简单说明。舒芜也把他的文章作了报告，那是说他的思想是完全由于我的影响，完全是演绎我的理论的。

二十三、12月1日，周扬、林默涵、严文井三同志来，谈了相当长的闲天。中间谈到搬家和工作问题，周扬同志问我参加工作还是到生活里去，说参加工作和一些群众在一起，有受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处，不过，周总理说也可以到朝鲜去。本来，我没有在北京参加工作（1950年在上海我是打算好好担负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委员会”的工作的），是一个被责难的焦点；前几天冯雪峰同志又叫我向林默涵同志提工作，说林默涵同志会向胡

乔木同志报告决定的；当时周扬同志又提到了我一向不赞成不把创作当做工作的看法；所以当时觉得也许周扬同志底两可提法是因为耽心我不愿意参加工作的缘故。因为这，我回答说：以我的情况看，也许参加工作的好，但同志们都了解我的情况，请由组织上决定。这还是从我确定了的“依靠组织”的原则这样说的。

二十四、12月11日，开第三次会，16日开第四次会。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出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周扬同志底发言更是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了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一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地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我。说我感到了党是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20多年